

# 甘青地區 第四次河湟事變（1928-1932年） 對當地傳教事業的影響

吳劍麗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 一 引言

中國西北向為少數民族聚居之地。早於十九世紀末，西方差會就在甘肅、青海地區以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為傳教對象，拓展傳教事業。民國十七年（1928年），甘肅河州爆發了馬仲英之亂，史上又稱第四次河湟事變。這場叛亂歷時四年，波及的範圍從甘肅、青海延至新疆；不僅對社會民生造成極嚴重的破壞，對當地傳教事業亦帶來沉重打擊。本文旨在整理第四次河湟事變的始末，並探討其對甘青地區社會及當地傳教事業的影響。

本文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簡述清朝期間第一至第三次河湟事變，此乃第四次回亂的重要背景。第二部分，整理第四次河湟事變前的社會局勢，及引爆叛亂的導火線。第三部分，是馬仲英之亂的經過，以及駐當地傳教士耳聞目睹的情況。這部分的焦點集中於甘青地區，至於

後期回亂戰線轉移到新疆的情況，因不在本文設定的範圍內，將不予細述。第四部分，嘗試分析回亂對甘青地區社會民生帶來的破壞。最後第五部分，探討回亂對當地傳教事業造成的影響。

本文的內容，主要來自刊載在《友穆季刊》(*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中駐甘青地區傳教士的信件及文章。《友穆季刊》由中國穆民交際會(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sup>1</sup> 出版，會員中部分正是駐甘青地區的傳教士；季刊恆常刊載他們寄自傳教站的信件。他們適逢其會，身處回亂現場，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貴資料。然而，鑑於駐甘青地區之傳教士，又身兼中國穆民交際會成員，同時投書予季刊者，主要為內地會及宣道會的傳教士，本文引用的資料不免有所局限。此外，回亂期間，消息封鎖，郵路斷續，當地傳教士有時反倒未能掌握全盤局勢，僅能盡其所知提供一些零碎的片段。這是本文的限制，謹此說明。

## 二 清代三次河湟事變

清朝以前，幾乎沒有回族叛亂的紀錄。自清以還，西北河湟地區卻爆發了數起回族反清暴亂，史稱「河湟事變」。頭三次事變於清朝發生，茲簡述如下。

---

<sup>1</sup> 中國穆民交際會於1927年成立，目的是接續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轄下的佈道回族特委(The Moslem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的工作，並凝聚各界關注中國穆宣工作的學者、傳教士及信徒。"May Meeting of the Society,"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1:2 (July 1927): 1.

## （一）第一次河湟事變

第一次河湟事變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發生。事緣伊斯蘭教新教在循化發展迅速，其興盛程度有蓋過老教之勢；<sup>2</sup> 兩教為爭奪教眾，經常發生衝突。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初，花寺及哲赫忍耶新舊兩教又發生械鬥。清廷出兵鎮壓，將新教判為邪教。此舉引致新教極度不滿，循化蘇四十三遂率撒拉族、回族起事。兩個多月後叛亂終被清廷平定。<sup>3</sup>

## （二）第二次河湟事變

同治年間（1862-1874年），爆發了第二次河湟事變。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川滇農民軍進入陝西南部。正值太平軍扶王陳得才聯合捻軍，從河南經陝西武關進入藍田，逼近西安；陝西華州的回族乘勢揭竿而起，渭河兩岸的回族亦紛紛響應，出現了「回股林立，通省（甘肅）沸騰」的現象，為持續十多年的陝甘回亂掀起序幕。<sup>4</sup>

是時，花寺門宦大阿訇馬占鰲聯合各門宦起事，攻下河州。同治六年（1867年）夏，清廷命左宗棠率部前往西北地區鎮壓。任甘肅回軍頭目的馬占鰲雖暫佔上風，卻主張戰勝而求撫。<sup>5</sup> 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馬占鰲勝左宗棠軍後，派長子馬七五前往安定，向左營請降；

---

<sup>2</sup> 舊教念經須用羊隻布匹，而新教念經僅需五十六文錢，貧苦大眾多願歸入新教。鄭天挺：《清史》（台北：知書房出版集團，2003），頁477。

<sup>3</sup> 馬通：《甘肅回族史》（蘭州：甘肅民族，1994），頁61～63。

<sup>4</sup> 崔永紅、張得祖、杜當順編：《青海通史》（西寧：青海人民，2012），頁426。

<sup>5</sup> 馬認為，百姓七、八年來已受盡戰火摧殘，不如與清廷議和為上。馬壽千：《馬壽千回族史誌論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09），頁306。另參"Former Mohammedan Rebellions in Kansu,"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II: 3 (21 July 1929): 9-10.

左欣然接受，並將馬七五改名馬安良，字翰如。<sup>6</sup> 馬占鰲部被左宗棠編入清軍馬旗三隊，仍以馬占鰲為督帶。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五月，左宗棠先後平定了陝西、寧夏、青海地區的回亂。<sup>7</sup> 是次回亂持續十多年，終於在1874年完全平息。

### （三）第三次河湟事變

第三次河湟事變，史上又稱「乙未河湟事變」，戰事波及甘南一帶。<sup>8</sup>

光緒二十年（1894年）冬十月，循化撒拉族老教、新教發生械鬥；由於地方官員處理不善，事態遂一發不可收拾。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春，先是西寧、海城、河州有回族起事，然後狄道、碾伯、大通、貴德等地相繼爆發回亂，河湟各地戰火漫天。清廷派喀什提督董福祥領甘軍回甘肅鎮壓。馬占鰲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去世後，其子馬安良繼續其眾，在北京以補用游擊督帶馬旗三隊；此時馬安良亦奉命隨同董福祥前往平亂。董福祥採「以回制回」策略，由安定出發，佔狄道、渡洮河，由馬安良沿途對回軍進行遊說招撫。十二月初，董福祥終解河州之圍。<sup>9</sup>

---

<sup>6</sup> 1918年的《字林報》（*North China Herald*）登載了馬安良的訃聞：「馬安良將軍（General Ma An-liang），於11月25日早晨在河州南關（South Suburb）去世，享年66歲。」訃聞形容馬安良是保守的穆斯林，效忠清廷。C. F. Snyder, "The Moslems of Hochow,"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II:1 (1 January 1934-15 Ramazan 1352): 3-4.

<sup>7</sup> 崔永紅、張得祖、杜當順編：《青海通史》，頁433～438。

<sup>8</sup> 劉繼華：〈清末民初宣道會甘肅傳教論述〉，《宗教對話與和諧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8），頁343～344。

<sup>9</sup> 馬壽千：《馬壽千回族史誌論集》，頁306～307。

以上三次河湟事變，均於清朝期間在甘青地區發生，起事民眾以回族為主，撒拉族等少數民族亦參與其中。三次回變，究其原因，有以下幾方面：第一，三起事變皆扛着反清旗號，反映清廷的民族政策未能滿足少數民族的期望；第二，少數民族長期身處民族及社會矛盾之中，尤其回漢衝突存在已久，一直無法消解；第三，伊斯蘭教內部教爭，老教與新教械鬥不斷，其中第一、三起事變就與教爭有直接關係。<sup>10</sup> 少數民族對朝廷、地方政府、漢族積怨日深，加上內部教爭，叛亂遂一觸即發。

至此，清朝再無大規模的回族叛亂出現。直至民國時期，始爆發第四次河湟之亂。

### 三 第四次河湟事變前的社會局勢及導火線

第四次河湟事變發生於民國時期。1925年1月，臨時政府的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段祺瑞任命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同年8月29日，復授權馮督辦甘肅軍務善後事宜，原甘肅督辦陸洪濤則調任甘肅省長。9月下旬，馮玉祥命西北軍（即1924年10月25日建立之國民軍）第二師師長劉郁芬為總指揮，率師進入甘肅。10月26日，國民軍正式進駐蘭州。<sup>11</sup>

#### （一）軍閥割據

是時，甘肅省由八位鎮守史分疆割據，分別為駐銀川的寧夏鎮守史馬鴻賓、駐涼州（今武威）的涼州鎮守史馬廷勳、駐甘州（今張掖）

---

<sup>10</sup> 喇秉德、馬文慧、馬小琴：《青海回族史》（北京：民族，2009），頁143～154。

<sup>11</sup> 崔永紅、張得祖、杜當順編：《青海通史》，頁487。

的甘州鎮守史馬璘、駐西寧的甘邊寧海鎮守史馬麒、駐天水的隴南鎮守史孔繁錦、駐平涼的隴東鎮守史張兆鉀、駐肅州（今酒泉）的肅州鎮守史吳桐仁、駐河州（今臨夏）的河州鎮守史裴建准。前四人為回族軍閥，後四人乃漢族軍閥。國民軍的進駐，對各鎮軍閥構成了一定的威脅。<sup>12</sup>

馮玉祥當時的策略是逐步削弱漢族軍閥的勢力，同時爭取各回族鎮守史的支持。馮一方面透過馬福祥、馬鄰翼等回族將領，向各回族鎮守史取得諒解；但另一方面，為牽制回族軍閥，馮同時又抽調馬鴻賓、馬廷勳、馬麒所部騎兵各一旅，編為西北獨立第七、八、九旅，聽從其徵調。<sup>13</sup>

1926年初，劉郁芬部退至西北，主持甘肅政務。劉郁芬在當地擴充軍隊，逐一肅清漢族軍閥。對回族軍閥，劉雖未即時予以清剿，卻改編西寧、涼州兩鎮守史部隊，歸屬國民軍管轄；又在四名回族軍閥的部隊中各抽一旅，限期集中陝西，其控制回族軍閥的用意不言而喻。<sup>14</sup>

1926年1月，直、奉兩系軍閥聯合反對國民軍，策動駐平涼的隴東鎮守史張兆鉀、駐天水的隴南鎮守史孔繁錦攻蘭州；馮玉祥不敵，一度敗走蘇聯。這次叛亂最終被國民軍平定。同年9月16日，馮玉祥自蘇聯回國，在綏遠五原誓師，組織中國國民軍聯軍，投向國民革命軍系列，響應北伐。<sup>15</sup>一直保持中立的馬麒為表示對國民軍投誠，經與西寧道道尹黎丹商議，決定黎辭任該職，空出的職位請馮玉祥派人接替。馮於是

<sup>12</sup> 崔永紅、張得祖、杜當順編：《青海通史》，頁487～488。

<sup>13</sup> 喇秉德、馬文慧、馬小琴：《青海回族史》，頁85。

<sup>14</sup> 喇秉德、馬文慧、馬小琴：《青海回族史》，頁99。

<sup>15</sup> 崔永紅、張得祖、杜當順編：《青海通史》，頁488～489。

撤銷了馬麒的甘邊寧海鎮使暨蒙番宣慰使職務，改任寧海護軍使（後稱青海護軍使）。<sup>16</sup>

1927年6月，甘肅省政府改為委員制，由劉郁芬任省主席，馬麒為委員之一。自國民軍入甘，漢族軍閥包括張兆鉀、孔繁錦、李長清、宋有才、黃得貴等已被陸續消滅，僅剩下回族軍閥。其中隴上八鎮中的六鎮亦已次第平定，僅餘馬廷勳、馬麒兩鎮。<sup>17</sup> 回族軍閥勢力大大受挫，如此政局，對稍後爆發的回亂不無影響。

## （二）社會動盪

在社會因素方面，甘肅河州亦有蘊釀叛亂之勢。是時，河州社會及民心皆不穩，原因有三：其一，國民軍西進後，自1926年9月起，由劉郁芬親信、國民軍第十七師師長趙席聘任河州鎮守史；趙在任期間不斷徵糧、募款、拔兵，百姓不分回漢均負擔沈重，民怨日深。<sup>18</sup> 其二，河湟地區向為回族聚居地，當局處理民族問題不善，造成違反伊斯蘭教禁忌的現象時有發生，激起回民的憤恨。其三，河州<sup>19</sup> 雖非大城市，卻是回族軍閥及梟雄的產地。河州西部正是西北回族馬氏軍閥的故鄉。馬氏軍閥幾代在西北政局上舉足輕重。馬麒（Ma Chi）曾任甘邊寧海鎮守史及護軍史，兼任青海蒙番宣慰史；弟弟馬麟（Ma Lin）<sup>20</sup> 曾任甘

<sup>16</sup> 喇秉德、馬文慧、馬小琴：《青海回族史》，頁86。

<sup>17</sup> 喇秉德、馬文慧、馬小琴：《青海回族史》，頁86。

<sup>18</sup> 喇秉德、馬文慧、馬小琴：《青海回族史》，頁87。

<sup>19</sup> 河州（Hochow）坐落大夏（Ta Hsia）河谷的中間部分，後易名「臨夏」，即「臨近大夏河」之意；市內清真寺林立，是西北伊斯蘭教重鎮。Y. P. Mei, "Stronghold of Muslim China," *The Moslem World* XXXI: 2 (April 1941): 179.

<sup>20</sup> 傳教士曾拜訪退休的馬麟。當時他已六十多歲，是謹守禮儀的穆斯林；他也極其關注抗日戰爭的發展，對蔣介石表示欣賞和效忠。Mei, "Stronghold of Muslim China," 184.

肅提督。馬麒的兒子馬步青（Ma Pu-ching）掌控甘肅河西走廊（Kansu Corridor）；另一個兒子馬步芳則於1936年任職青海省長。<sup>21</sup> 河州西南部則出了多位寧夏將領，包括平定義和團之亂的回族將軍馬福祿（Ma Fu-lu），及其任八十四軍團司令的兒子馬鴻賓（Ma Hung-pin）。馬福祿之弟馬福祥（Ma Fu-hsiang）在民國初期曾任安徽省長及青島市長；其子馬鴻逵（Ma Hung-k'uei）曾任寧夏省長。<sup>22</sup> 俗語說：「（河州）三十年一小亂，六十年一大亂」，<sup>23</sup> 當地之所以成為回亂的溫床，實有跡可尋。

### （三）新舊教爭

民國十七年（1928年）4月，河州西鄉、南鄉的新教老教間又生教爭。河州鎮守史趙席聘以武力調處，把西鄉百姓推選的請願代表馬寶等處死，惹起當地回民的激烈反抗。此事成為第四次「河湟事變」的導火線。<sup>24</sup>

不穩的政局以及社會狀態，早令甘青地區的回族上至軍閥、下至百姓心生不滿。至教爭再起，漢族鎮守史又處理不善，終令回亂一觸即發。

---

<sup>21</sup> Mei, "Stronghold of Muslim China," 183.

<sup>22</sup> 馬鴻逵（Ma Hung-k'uei）的教養和背景更接近中原。他在家鄉建立了許多優秀的學校，以記念他的父親。Mei, "Stronghold of Muslim China," 184.

<sup>23</sup> 崔永紅、張得祖、杜當順編：《青海通史》，頁490～491。

<sup>24</sup> 喇秉德、馬文慧、馬小琴：《青海回族史》，頁86。



## 四 回亂現場——第四次河湟事變經過及當地傳教士的處境

第四次河湟事變由馬仲英（Ma Chong-ying）發起。馬仲英即馬寶之子，馬麒之堂侄，生於馬氏軍閥之家。馬仲英外號「尕司令」，<sup>25</sup>十五歲入伍，十七歲代父任職寧海軍營長。1928年5月，馬仲英得知父親被處決，遂祕密聯絡了馬騰、馬虎山、馬儀、馬古力拜、馬七二、馬丹巴等寧海軍下級官佐，商定起事。<sup>26</sup>

### （一）三圍河州

1928年5月2日，趁主麻日回民入寺作禮拜之際，馬仲英帶領七人離開西寧，潛入循化縣城。<sup>27</sup>他們在循化奪取縣署的公款和警察的槍支，又打開監獄放出囚犯，一夥人東進河州；至河州西鄉三花觀，正式宣告起事。馬仲英提出「不殺回人不殺漢，專殺國民辦事員」、「回漢一條心，趕走國民軍」等口號，成功發動了回族、東鄉族、撒拉族，甚至漢族等羣眾三千餘人，<sup>28</sup>成立「黑虎吸馮軍」，由馬仲英自任司令。<sup>29</sup>

1928年5月10日，馬仲英率部圍攻河州，與劉郁芬部展開激戰，不敵；至5月23日，河州圍解。馬仲英第一次圍攻河州失敗後，重整隊

<sup>25</sup> 西北話「尕」是小的意思，發音 "ka"，「尕司令」聽起來就像英語 "gasoline"。Mei, "Stronghold of Muslim China," 178-79.

<sup>26</sup> 崔永紅、張得祖、杜當順編：《青海通史》，頁491。

<sup>27</sup> 臨夏縣誌編纂委員會編：《臨夏縣誌》（蘭州：蘭州大學，1995年），頁477。

<sup>28</sup> 其中包括西寧馬銳部隊和馬全欽的兩團嘩變部隊。馬通：《甘肅回族史》，頁100。

<sup>29</sup> 顧名思義，「黑虎吸馮軍」以反對馮玉祥為目標。崔永紅、張得祖、杜當順編：《青海通史》，頁492。

伍，把「黑虎吸馮軍」易名為「西北邊防聯盟軍」，仍自任司令；派馬良為軍師，下編三個旅，又派馬虎山為一旅旅長，馬培賢為二旅旅長，普照明為三旅旅長。<sup>30</sup> 6月27日，馬仲英與馬廷賢率部第二次圍攻河州，復被劉郁芬擊退。8月中旬，馬仲英第三次圍攻河州。這次劉郁芬、馬鴻賓數度向馬提出議和，但不成功。至11月下旬，劉郁芬決定停止議撫，全力鎮壓，於12月初向河州發起總反擊。馬仲英終再告失敗。<sup>31</sup>

## （二）到處為患——從甘南到寧夏

1928年底，回軍在河州雖被鎮壓，叛亂卻未就此平息。馬仲英離開河州後，率部竄入甘南、青海、河西、寧夏等地，到處為患。1928年12月，馬仲英部經臨洮、隴西，攻破武山、甘谷、秦安等縣城。期間，旅長韓進祿與馬發生分歧，於12月21日率部轉攻天水，被國民軍吉鴻昌部擊敗。<sup>32</sup> 馬仲英則竄到甘南地區。<sup>33</sup>

其後，馬仲英和韓進祿重新匯聚，分編了一個獨立師、五個騎兵旅，準備繞道甘南、湟中前往河西、寧夏。<sup>34</sup> 1929年2月3日，馬仲英竄入青海循化保安（今同仁）地區。2月5日，馬部洗劫五屯，全屯上下莊300多戶居民，包括漢藏百姓共數千人遭殺戮。<sup>35</sup> 在國民軍二方面軍總

---

<sup>30</sup> 馬通：《甘肅回族史》，頁100。

<sup>31</sup> 崔永紅、張得祖、杜常順編：《青海通史》，頁492~494。

<sup>32</sup> 谷苞：《西北通史（第五卷）》（蘭州：蘭州大學，2005），頁278。

<sup>33</sup> 有駐甘肅傳教士聽見消息，指馬仲英到甘南後，曾與當地土司發生衝突。  
"Moslem Rebellion in Kansu,"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II: 3 (21 July 1929): 9.

<sup>34</sup> 其時馬廷驥已被劉郁芬逐出河西，回到大河。馬廷賢則藏身河州地區。馬通：《甘肅回族史》，頁102。

<sup>35</sup> 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西寧：青海人民，2007），頁99。

指揮孫連仲追捕下，馬仲英於2月8日連夜率部順拉脊山逃入青海貴德。<sup>36</sup> 2月10日（農曆大年初一）經魯沙爾（今湟中縣）向湟源推進。駐湟源的馬步元（馬麒親侄）一直對國民軍心存不滿，遂與馬仲英暗中聯絡。2月15日，馬仲英兵臨湟源縣城下，當地士紳雖竭力抗守，惟馬步元與馬仲英裏應外合，讓後者輕易攻陷湟源縣城。入城後，馬仲英縱部搶掠戮殺。當日，城內民團及百姓遭屠殺者就達2,400人，傷者逾千，財貨被搶掠一空。<sup>37</sup>

關於馬仲英血洗湟源一事，在傳教士的信件中有詳細記述。據內地會傳教士安獻今（G. Findlay Andrew）所知，1929年2月15日當天，馬仲英部攻入湟源（Tangar）縣城後，僅兩小時就把整個縣城搶掠一空。城內一對傳教士夫婦，親耳聽到部分回軍頭目下令禁止部屬燒毀英商仁記洋行（Messrs. William Forbes and Co.）的房屋，惟漢族男人從十七至七十歲的都格殺勿論。結果，在兩小時內，共2,170漢族男人被回軍屠殺。<sup>38</sup>

湟源哀鴻遍野，惟國民軍自西寧趕至時，馬仲英早已逃往大通。被國民軍包圍府第的馬步元自殺身亡。<sup>39</sup> 馬麒隨即派馬麟部前往截擊馬仲英，至老虎口卻不敵。1929年3月，馬仲英經扁都口再竄至河西。攻入永昌後，殺2,299漢族百姓；又至民勤縣，殺縣長、民團及漢族百姓逾4,600人。<sup>40</sup> 其後馬仲英率部攀越12,000呎高山，逃往西藏，以避開國

<sup>36</sup> 高占福：《西北穆斯林社會問題研究》（蘭州：甘肅民族，1991），頁363。

<sup>37</sup> 崔永紅、張得祖、杜常順編：《青海通史》，頁494。

<sup>38</sup> Rev. G. Findlay Andrew, O. B. E., "Islam in North-West China To-day,"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4 (1 October 1932-30 Jumada-ula 1351): 54-55.

<sup>39</sup> 喇秉德、馬文慧、馬小琴：《青海回族史》，頁88～89。

<sup>40</sup> 馬通：《甘肅回族史》，頁103。

民軍步兵的追捕。據傳教士耳聞目睹，從岷州(Minchow)村鎮到西藏東北部，馬部所到之處都儘行殺戮搶掠。<sup>41</sup> 其中湟源、永昌和民勤三次屠城，更是血流成河。

回亂導致死傷無數。鄰近縣城即便倖免於屠城之劫，亦人心惶惶，氣氛緊張。內地會傳教士濮美瑛(Olive Botham)於1929年初正身處甘肅清水縣(Tsingshui)。回軍屠湟源後，她在同年2月26日的信中提及，剛到埽時，縣城為防亂匪，城門緊閉，後期局勢稍為平靜後方才重開。清水縣人口雖以漢族為主，但由於附近有一些回族集鎮(market-towns)，故亦有不少回族聚居。濮美瑛的房東也是回族，家在張家川(Chang chia chuan)附近，當地是甘南回民重鎮，也是回亂的中心。<sup>42</sup>

在國民軍吉鴻昌部追擊下，馬仲英於1929年4月中旬竄入寧夏及河套地區，一度攻佔寧夏城(今銀川)。兵力懸殊，馬仲英自知寧夏城難以固守，決定棄城逃往磴口一帶。吉鴻昌部於是進駐寧夏省城，任第十軍軍長、寧夏省政府主席，主持寧夏軍政。<sup>43</sup> 馬仲英留下的部隊則大部分被吉鴻昌收編，駐紮寧夏各地。<sup>44</sup>

內地會傳教士海春深(George K. Harris)一家於1929年到達青海西寧，與駐當地傳教站的負責人連福川牧師及師母(Rev. and Mrs. F. D.

---

<sup>41</sup> "Moslem Rebellion in Kansu," 9.

<sup>42</sup> 新教創始人馬善仁(Ma Shan-ren)的家鄉就在張家川；馬的外甥在大地震中身亡。"News from the Field: Miss Olive Botham in Tsingshui, Kansu,"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II: 3 (1 July 1929): 6.

<sup>43</sup> 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組織部、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黨史研究室、寧夏回族自治區檔案局：《中國共產黨寧夏回族自治區組織史資料(1926-1987)》(銀川：寧夏人民，1992)，頁18。

<sup>44</sup> 丁明俊：《回族學研究文集》(北京：民族，2003)，頁260。

Learner) 一同傳教。據海春深1930年2月的記錄，當時回軍有橫掃甘青地區之勢，西寧亦一度兵臨城下。傳教士因城門封閉而無法按原定計劃往鄉郊佈道。西寧危急之際，五萬國民軍趕至，與回軍對戰。海春深聽聞西寧南部及西部均爆發激烈戰事；西面一個城市更因支持國民軍而遭洗劫，數千百姓被叛軍所殺。此役國民軍和回軍雙方均傷亡慘重。<sup>45</sup>

### （三）投誠與變節

馬仲英失意寧夏後，出走天津；因殘部悉被收編，他本人僅帶着少數部下到北平，後再經北平轉赴南京。<sup>46</sup> 1930年3月，馬仲英自北平到南京見馬福祥，經後者介紹，前赴國民革命軍討逆軍第十五路軍總部山東泰安，從屬馬鴻逵。<sup>47</sup> 其時，馬鴻逵任第十五路軍總指揮，馬仲英則受命為第十五路軍第二縱隊司令（又稱第二旅旅長），接受軍餉四千萬。蔣介石為牽制馮玉祥國民軍，改任馬廷勳為討逆軍第十五路軍總指揮，任馬廷賢為下屬第一縱隊司令。馬仲英作為第二縱隊司令，受蔣之命回甘肅收編舊部，襲擾馮玉祥部後方。<sup>48</sup> 不過，馬仲英以自己屈居二「馬」之下，對蔣的任命極為不滿；於是他將部隊從黃渠橋撤至後套，<sup>49</sup> 駐在磴口縣三盛公一帶。<sup>50</sup>

---

<sup>45</sup> 據說此役有三千國民軍兵被殺。George K. Harris, "News from the Field: Sining, Chinghai (KoKo Nor)."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1 (1 January 1931-11 Sha'ban 1349): 19.

<sup>46</sup> 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組織部、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黨史研究室、寧夏回族自治區檔案局：《中國共產黨寧夏回族自治區組織史資料（1926-1987）》，頁22。

<sup>47</sup> 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蘭州：甘肅省文史研究館，2006），頁326。

<sup>48</sup> 谷苞：《西北通史（第五卷）》，頁235。

<sup>49</sup> 馬仲英部駐後套時，麾下約有三千人。谷苞：《西北通史（第五卷）》，頁279。

<sup>50</sup> 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頁325。

當時局勢甚為混亂。據海春深於1930年3月的記錄，坊間傳言，有不少回族國民軍變節，紛紛加入叛軍行列。回民地區處處設步哨（quivive），恐防有人乘亂起事。城內局勢緊張，海春深等仍無法恢復佈道工作。至1930年4月，回軍轉往北面搶掠，西寧城門始得以重開。<sup>51</sup>

1930年5月，回亂臨到秦州。其實自4月始已流言四起，指馬廷賢率領的一支回軍，正向秦州進發。5月6日，回軍果然兵臨城下，城內的傳教士聽見槍聲自北面傳來，繼而從東到南。其時秦州城內只有約三百守軍和些許義勇軍，根本不堪一擊；守軍亦紛紛棄城逃亡。回軍不費吹灰之力攻入城內，大肆打砸搶燒。當天就屠殺了秦州城四千多百姓。<sup>52</sup> 其後，馬廷賢部為川軍和甘肅討逆軍所敗，逃遁寧夏。<sup>53</sup>

1930年7月，馬仲英由山東泰安經天津、包頭至寧夏。<sup>54</sup> 馬仲英得到中衛駐軍的歸附，收歸了一些舊部及因災荒流離的民眾，集千餘人的勢力，從寧夏二返河西。<sup>55</sup> 馬仲英重返河西後，積極整頓部隊，自稱甘寧青聯軍總司令，設總部於甘州（今張掖）。<sup>56</sup>

1930年12月，馬仲英宣布成立「甘寧青聯軍總司令部」，自任甘寧青保安司令，下設八大處，撤換肅州、甘州十一縣縣長。<sup>57</sup> 1931年3

---

<sup>51</sup> Harris, "News from the Field," 19-20.

<sup>52</sup> 黃錫培：《捨命的愛：中國內地會宣教士小傳》（美國：中信，2006），頁204～205。

<sup>53</sup> 甘肅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甘肅省民族志編纂委員會合編：《甘肅省志（第70卷）》（蘭州：甘肅人民，2003），頁141。

<sup>54</sup> 臨夏縣志編纂委員會：《臨夏縣志》（蘭州：蘭州大學，1995），頁639。

<sup>55</sup>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第6-9卷）》（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86。

<sup>56</sup> 臨夏縣志編纂委員會：《臨夏縣志》，頁639。

<sup>57</sup> 張樹彬：《馬鴻逵傳（第一卷）》（銀川：寧夏人民，2008），頁158。

月，馬仲英設河西省，謀劃甘州四縣、肅州七縣共十一縣，並自任省主席。<sup>58</sup>

期間，西寧政局亦有變。1930年11月馮玉祥軍隊撤退後，馬麒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Governor）。<sup>59</sup> 1931年，蔣介石任命馬鴻賓為甘肅省政府主席（Governor-General），為該省第一位回族的省政府主席。回族軍閥似乎漸漸重新得勢。<sup>60</sup>

有見馬仲英勢力擴展迅速，時任西北軍新編第九師師長的馬步芳<sup>61</sup>遂於1931年4月，由西寧經門源扁都口出兵攻打馬仲英。雙方在洪水（今民樂）三堡、六壩地區發生激戰，<sup>62</sup> 馬步芳於民樂縣境擊敗馬仲英部，進佔甘州（今張掖）。<sup>63</sup> 馬仲英新編的第三十八師原來就不足千人，守衛甘州的馬殘部二百多人雖向馬步芳投降，仍全數被砍死。<sup>64</sup> 馬仲英被逼從甘州退至肅州。<sup>65</sup>

1931年6月，馬仲英以甘新寧三省聯軍總司令的名義，打着「奉蔣總司令之命」的旗號，率部七百餘人進入新疆。他封鎖甘新交通，又截斷新疆與南京的聯繫，為反金樹仁及佔據新疆作準備。<sup>66</sup> 入疆後，馬仲

---

<sup>58</sup> 谷苞：《西北通史（第五卷）》，頁162。

<sup>59</sup> Harris, "News from the Field," 20-21.

<sup>60</sup> Andrew, "Islam in North-West China To-day," 56-57.

<sup>61</sup> 臨夏縣志編纂委員會：《臨夏縣志》，頁635。

<sup>62</sup> 高占福：《西北穆斯林社會問題研究》，頁365。

<sup>63</sup> 谷苞：《西北通史（第五卷）》，頁235。

<sup>64</sup> 高占福：《西北穆斯林社會問題研究》，頁365。

<sup>65</sup>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1994。另參崔永紅、張得祖、杜常順編：《青海通史》，頁494~495。

<sup>66</sup> 谷苞：《西北通史（第五卷）》，頁162。

英與反對金樹仁的維族頭目和加尼牙孜及堯樂博斯二人會合，圍哈密，攻鎮西，與金樹仁軍在三角井激戰。7月，馬仲英大破金軍。金樹仁作戰失利，遂派盛世才為剿匪軍總司令部參謀長。<sup>67</sup> 1931年10月，盛世才會同白俄歸化軍擊敗馬仲英。馬仲英退回甘肅，一面擴充兵力，廣招東干、回族青年，一面繼續與新疆維族叛軍聯繫。<sup>68</sup>

內地會傳教士趙立德 (Raymond H. Joyce) 及石愛樂 (Otto F. Schoerener) 於1932年到新疆傳教。據他們所知，過往統治者一直採取獨裁管治。他們初抵新疆，即發現統治者奉行愚民政策，並未善待回民，回亂爆發不無原因。他們聽聞，馬仲英於1931年圍哈密 (Hami) 時，地方實行管制達四個月之久。回亂比內戰更恐怖，叛軍所到之處儘行燒殺搶掠，如同進行殺人比賽，用殘忍的方法濫殺無辜。<sup>69</sup>

1932年，在甘肅宣慰使孫蔚如轉經楊虎城的斡旋下，馬仲英再接受國民政府招撫，被編入新編三十六師任師長，列縣國民軍正規軍，劃定安西、敦煌、玉門、酒泉、高台、臨澤、鼎新各縣為其駐防地。馬仲英開始在酒泉練兵，整治部隊。<sup>70</sup> 同年年底，馬仲英以反對金樹仁為名，再次率全師從甘肅攻入新疆。馬仲英部隊分擾天山南北，他指派馬福祿率部圍攻迪化，他本人則圍攻哈密。在與當地維族叛軍頭目聯合下，在哈密、古城子擊敗省軍張治賢等。<sup>71</sup>

---

<sup>67</sup> 盛世才，遼寧人，曾於上海、廣東、日本等地學習政治軍事；1930年起任職新疆邊防督辦公署。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三版（香港：中大，2005），頁617。

<sup>68</sup>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617。

<sup>69</sup> 1933年山區再爆發回亂，蔓延吐蕃 (Turfan)。Raymond H. Joyce and Otto F. Schoerener, "Sinkiang,"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II:1 (1 January 1934-15 Ramazan 1352): 12-13.

<sup>70</sup> 丁明俊：《回族學研究文集》，頁261。

<sup>71</sup> 馬通：《甘肅回族史》，頁105。



1933年初，金樹仁以盛世才為東路剿匪總司令，在哈密一帶與反政府的回軍作戰。<sup>72</sup> 詎料，1933年4月12日，邊防督辦公署參謀長陳中導與白俄歸化軍指揮巴平古特（Papengout）發動政變，驅逐金樹仁，擁教育廳長劉文龍為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為邊防督辦。馬仲英雖不停進攻，惟最後仍被盛世才擊敗，退走南疆。<sup>73</sup> 自此，回亂戰線完全轉入新疆，河湟地區的回亂終告一段落。

#### （四）小結

第四次河湟事變，觸發點固然是由於國民軍徵發苛忍，輕率處理民族宗教問題等；但除此以外，亦因為甘青地區回族軍閥地位備受威脅，導致其與國民軍之間出現角力。從西北馬家軍閥在回亂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可見一斑。馬仲英固然出自軍閥之家；馬廷賢、馬廷勳乃馬安良之子，而參戰的骨幹又多是馬麒、馬廷勳部下，他們的基本立場都是維護回族軍閥的利益。因此，甘青地區的回亂，不僅是馬仲英個人的野心釀成，與馬麒等回族軍閥的立場和策略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sup>74</sup>

這場波及甘肅、青海、新疆的河湟事變，歷時四年之久。馬仲英三度圍攻河州不果，敗走洮岷、循化保安、扁都口、河西期間，沿途燒殺搶掠，致甘青寧數省死傷者眾。1929年4月，馬仲英在國民軍追擊下一度逃往寧夏，又避至河套地區；至1930年重返河西，一度佔領張掖，最終被馬步芳逐出關外。<sup>75</sup> 四年之間，叛軍兵敗即四處流竄，所到之

<sup>72</sup> 馬通：《甘肅回族史》，頁105。

<sup>73</sup>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617。

<sup>74</sup> 崔永紅、張得祖、杜常順編：《青海通史》，頁495。

<sup>75</sup> 崔永紅、張得祖、杜常順編：《青海通史》，頁490～495。

處，打砸搶燒無所不為，一遇反抗更立即屠城；在回亂期間遭屠戮的人數超過二十萬。<sup>76</sup> 這場事變雖最終落幕，然而所造成的人命財產損失，以至更長遠及深層的負面影響如民族矛盾、社會不穩等後果，實難以估計。

## 五 第四次河湟事變對社會民生的影響

馬仲英之亂，無論在時間、地區範圍，及破壞程度等方面，都超越了清朝期間三次回亂。以下將從三方面分述這場回亂對甘青地區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 （一）生靈塗炭，民生困苦

第四次河湟事變，前後歷時四載之久。叛變期間，馬仲英率部橫掃甘青地區，甚至遠達新疆。叛軍所到之處，搶掠燒殺，致死傷枕藉。據保守估計，僅1928年4月至10月，即馬仲英三圍河州期間，就有二十萬名無辜百姓死亡。同年11月後，馬部四處流竄，被殺者更不計其數，無數百姓家破人亡。<sup>77</sup> 回亂期間，特別在1930至1931年，甘州和肅州兩地成為叛軍的軍糧物資供應站；兩地百姓人窮財盡，不少淪為餓殍，甚或落草為寇，加入叛軍行列。

---

<sup>76</sup> 1928年在南郊區的毀壞痕跡在二十年後猶歷歷在目，人們仍常常提起「尕司令」，及國民黨（Kuominchun/People's Army）掌政前八坊的繁華歲月。Mei, "Stronghold of Muslim China," 180.

<sup>77</sup> "Moslem Rebellion in Kansu," 9.

為鎮壓回亂，政府動用大量軍力，又徵重稅以為軍備，導致民生加倍困苦。內地會駐甘肅清水的傳教士濮美瑛於1930年4月21日的信件中記述，國民軍駐紮縣城，城內馬匹和騾子統統被軍隊徵用；後來百姓連驢子也得藏起來，免得被徵用。當時，濮美瑛正要離開清水縣，需要牲口，好不容易才找到四匹小驢。治安不靖，路途艱險，幸而濮美瑛的房東一向善待她們，除了堅持送贈糧食、馬匹外，更派了一個僕人護送。旅程中，沿途都是純回民區。濮美瑛遇到三名漢族婦女，其中二人都是軍眷。她們訴苦指去年（即1929年）因到處是土匪，日子過得很艱難；「回軍來了十二次，軍隊也來了十二次！」饑荒和搶掠，令當地繁華不再，了無生氣。<sup>78</sup> 從傳教士的描述中，可見回亂對民生帶來的破壞。

兵燹以外，還加上天災。甘肅省歷年飽受大地震蹂躪。早於1920年12月16日，甘肅海原（今屬寧夏）發生8.6級大地震。據報地震中全省死了十八萬人，另五十萬災民無家可歸，災情慘重。<sup>79</sup> 馬仲英叛亂前夕，在1927年5月23日，甘肅古浪發生另一次大地震，達8.0級，在十分鐘內死亡人數達十萬，數十萬人無家可歸。<sup>80</sup> 緊接1928年，西北鬧大旱，「夏秋顆粒未收」，演變成大饑荒；其中尤以陝西及甘肅災情最嚴重，災民佔人口幾近80%，餓殍載道。<sup>81</sup> 至1929年，饑荒愈發加劇，單

---

<sup>78</sup> 濮美瑛的母親曾到過此地，印象中這裏的回民外表出眾，都騎着駿馬；市面比清水更繁華，還有一個很大的市場。重訪此地，馬匹幾乎看不見了（被徵用去了），市內也繁華不再。Olive Botham, "Tsingshui, Kansu,"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V:4 (1 October 1930-8 Jemadi-al-awal 1349): 9-11.

<sup>79</sup> 亦有指海原大地震死難者達二十萬人，主因是地震導致黃土大規模滑坡，摧毀了數百個村鎮。參陳希哲：《土地學地基基礎》（北京：清華大學，2004），頁514。

<sup>80</sup> 中國地震歷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總編室：《中國地震歷史資料匯編（第4卷第1篇）》（科學，1983），頁360。

<sup>81</sup> 秦安縣志編纂委員會：《秦安縣志（第2卷）》（蘭州：甘肅人民，2001年），頁772。

是蘭州的災民就達13.8萬人。<sup>82</sup> 戰禍不斷，饑荒連年，疫症叢生，這一切對民生打擊甚大，短期內無法復元。

## （二）回漢仇恨加深

清朝期間，甘肅回族發起了三次叛變，成為清廷甚感頭痛的問題。三起回亂，並未隨着改朝換代而終結，在民國時期再爆發馬仲英之亂。四次回亂，不僅令甘青地區生靈塗炭，民不聊生；更因回漢兩族之間的仇恨無未消解，反在接二連三的衝突仇殺中累積更深。從駐甘青傳教士與當地回漢民族的日常接觸中，可略知一二。

內地會傳教士安獻今在報告中講述哲赫忍耶教長馬元章（Ma Yuen Chang）<sup>83</sup> 的生平事蹟時，順帶提及在第四次河湟事變之前數年，幾乎爆發了另一次大規模回亂。據內地會傳教士安獻今的報告，民國九年（1920年）年底，回軍早計劃發動暴亂。12月16日晚上，叛軍正式開戰，在街上開始屠殺漢族。詎料頃刻間發生大地震，短短十分鐘，造成二十多萬人喪生；回亂計劃亦胎死腹中。據安獻今記述，地震發生時，馬元章正在其中一個女婿家裏，樓房倒塌把老人活活壓死，其後葬在張家川宣化崗拱北。馬元章在回族中德高望重，他的死給增添了許多神話化的描述；例如有指馬元章一死，大地亦為之震動，這類倒果為因之說

---

<sup>82</sup> 蘭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蘭州市志（第23卷）》（蘭州：蘭州大學，2000），頁3。

<sup>83</sup> 馬元章是哲赫忍耶學派教長馬明心的後人。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馬明心受弟子蘇四十三牽連，於陰曆三月二十七日在蘭州被處決，家裏所有男丁都被發配雲南。馬明心的孫子馬聖麟在雲南重整旗鼓，影響力從雲南遍及喀什噶爾，引起清廷的疑忌。同治十年（1871年），馬聖麟連同一千多村民被清軍炸死，其子馬元章逃離雲南，輾轉到達甘肅張家川。Andrew, "Islam in North-West China To-day," 52-54. 另參Mrs. Charles L. Ogilvie, "Report of Rev. G. F. Andrew's Address in New York,"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1 (January 1932-21 Sha'ban 1350): 2.

多不勝數。然而，老一輩的漢族基督徒卻認為死傷無數的海原地震，乃是上帝的作為！原因是「落入永生神的手中，總比落在人的手中好。」他們寧願在地震中喪生，也不欲被回軍所擒殺。<sup>84</sup> 回漢仇恨之深可以想見。

另一起激發民族仇恨的事件，乃國民軍火燒八坊。八坊位於河州南關，人口四萬多；建有十二座清真寺，即著名的「八坊十二寺」，乃甘肅伊斯蘭教重鎮。馬仲英第二次圍攻河州，鎮守史趙席聘把城內漢民組成三個民團以守城。其後馬仲英攻城不克敗逃，國民軍即炮轟河州西郊的大拱北。趙席聘下令漢族民團帶上火柴隨軍出城，火燒八坊。<sup>85</sup> 據說大火整整燒了六晝夜方才熄滅，令八坊變成一片焦土，一幢幢華麗的歷史建築，及四萬多回民的家園都付之一炬。這件事不僅更激發回族對漢族的仇恨，亦因為八坊無數回民無家可歸，索性加入叛軍行列。<sup>86</sup> 這種情況在別的回民區也不鮮見。1930年7月，內地會傳教士海春深在離西寧兩天路程的「上五村」（Upper Five Villages）作街頭佈道時，發現聽眾中有很多回族青年；他們中間不少人在數月前還是叛軍的一分子，亂事暫停，他們就返回老家，搖身一變又成為良民。<sup>87</sup>

內地會駐甘肅傳教士賈素珍（Miss S. J. Garland）聽聞河州和臨洮兩地都有回軍屠殺漢族的事情發生，惟死亡人數不詳。<sup>88</sup>

---

<sup>84</sup> Andrew, "Islam in North-West China To-day," 52-54. 另參Ogilvie, "Report of Rev. G. F. Andrew's Address in New York," 3.

<sup>85</sup> 馬通：《甘肅回族史》，頁102。另參崔永紅、張得祖、杜常順編：《青海通史》，頁492。

<sup>86</sup>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銀川文史資料（第10卷）》（銀川：寧夏人民，1999），頁98。

<sup>87</sup> Harris, "News from the Field," 19-20.

<sup>88</sup> 由於所有駐甘肅傳教士的信件都被截查，她們雖身在當地，卻反而未能掌握全面的局勢。賈素珍從報章僅得知馬福祥將軍（General Ma Fu-hsiang）發了一個公告，內容

回漢冤冤相報的事件層出不窮。馬仲英第一次圍河州，有堵截國民軍的回族竟乘亂圍攻漢族聚居的寧河城，歷時六個月，加上瘟疫肆虐，令城內漢族百姓苦不堪言。<sup>89</sup> 其後馬仲英屠湟源時，城內漢族百姓死傷無數；當地漢民為報復洩憤，在馬仲英逃離西寧後，把湟源東關的回民全數殺害。<sup>90</sup>

傳教士日常接觸回漢民族，亦感受到兩者間的嫌隙和張力。漢族即便皈依了基督教，對回族仍心存成見。宣道會駐河州傳教士德文華（C. F. Snyder）所認識的漢族同工曾說：「我們在回族手裏，如同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手裏。」<sup>91</sup> 有的漢族信徒拒絕向回族傳道，有的從不肯借東西給回族鄰居，更有的認定所有回民都是強盜、土匪，隨時會攻擊漢族。漢族朋友的態度，有時叫傳教士很為難。另一方面，回族朋友又會勸傳教士不要住在那些「拜偶像者」（即漢族）中間，以免生命財產受威脅。<sup>92</sup>

內地會傳教士濮美瑛的經歷，可說明仇恨早深植於回漢民族之間，連孩童也不能倖免。濮美瑛跟兩個分別九歲和十三歲的回族男孩建立了友誼，二人經常到訪傳教士的家，席間無所不談。一次，濮美瑛出

---

之意是安撫甘肅的回民；又批准向單身女性發護照，准她們前往甘肅。Miss S. J. Garland, "Destruction of Moslem Quarters, Hochow,"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I:4 (October 1928): 12-13.

<sup>89</sup> 馬通：《甘肅回族史》，頁102。另參崔永紅、張得祖、杜常順編：《青海通史》，頁492。

<sup>90</sup> 喇秉德、馬文慧、馬小琴：《青海回族史》，頁88~89。

<sup>91</sup> 馬仲英之亂後，政局仍然掌握在回族手中。C. F. Snyder, "The Moslems of Hochow,"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II: 1 (1 January 1934-15 Ramazan 1352): 4-5.

<sup>92</sup> Olive Botham, "One Difficulty in China,"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3 (1 July 1931-14 Safar 1350): 17-18.

門數星期後返回工場，兩個男孩特來探訪。碰巧當天有漢族朋友作客，氣氛異常。原來平日滔滔不絕的漢族朋友突然沈默不語，不得不說話時也只蹦出個單字。終於有客人按捺不住問：幹嘛要請這些「回回娃」來？不知何時，兩個「回回娃」已悄悄溜走了。濮美瑛對此事印象甚深。<sup>93</sup>

另外一次，濮美瑛與母親在清水縣附近一個純回族城鎮短住了兩個月。所到之處都受到當地回民的親切接待。惟獨有一次例外。當天有回族朋友到訪她們住處，言談甚歡之際，碰巧一個漢族信徒也來訪，雙方一言不合即起了激烈的衝突，結果又是不歡而散。<sup>94</sup>

另一個例子。濮美瑛和母親到清水縣定居不久，就發現當地回漢之間矛盾甚深。濮美瑛曾經向一個漢族男孩打探縣城裏有沒有回族居住，男孩斷然回答：「我們不歡迎他們在城裏住！」男孩全家紛表同意。某日，濮美瑛前往附近一個村鎮，路上碰到三個漢族男孩。濮提到路旁的小溪美麗又乾淨時，其中一人說：「那些小教民（small religion people，指穆民）在這條小溪取水，我們才不會！」另一個男孩搶着說：「他們曾經在水桶內找到一個人頭！」並暗示這不是一樁意外事件。<sup>95</sup> 仇恨已深至不願同住一地、共飲一水的程度。

回漢衝突的根源僅是宗教問題？濮美瑛認為，民族因素恐怕佔更大比重。她也觀察到，兩個民族雖然在同一個市場做買賣，在同一個地點幹活，然而雙方對彼此的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等其實所知甚少；<sup>96</sup> 隔

<sup>93</sup> Botham, "One Difficulty in China," 17-18.

<sup>94</sup> Olive Botham, "News from the Field: Tsinchow, Kansu,"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2 (1 April 1931- 11 Zul-I-Qu'da 1349): 23.

<sup>95</sup> Botham, "News from the Field," 4-5.

<sup>96</sup> Botham, "News from the Field," 24.

閩令敵意更不易消融。上述衝突事件都發生在1929至1930年間，亦即馬仲英之亂期間；回亂顯然加深了雙方的仇恨。<sup>97</sup>

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回漢兩族雖然彼此為仇，甚至不相往來；但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不可避免地有交集及互相影響之處。以河州為例，部分回族習染了漢族的看吉凶日、抓沙散地、酗酒、抽鴉片等，這些惡習原與伊斯蘭教信仰相違。作為甘肅伊斯蘭教重鎮的河州八坊（Pa Fang），就有兩成回族人口，既染上鴉片煙癮，同時也為漢族開的鴉片舖子運售鴉片。另一個例子，1933年春節期間，河州有幾個回族學生偷偷跑去觀看漢族的舞龍表演，被阿訇痛斥後，其中一人竟因受驚過度死去。<sup>98</sup> 回漢民族雖仇深似海，但在生活的不同層面上又難免互相影響；從上述事例，反映回族受漢族影響尤多。

### （三）回族遷徙

西北回族因回亂而四處流徙，並不是馬仲英之亂後才發生的事。<sup>99</sup> 早於清朝期間第一次及第二次河湟事變後，已出現回族被迫遷徙的情況。<sup>100</sup> 回亂被清廷鎮壓後，陝西及甘肅有大批回族流徙到新疆以至中

---

<sup>97</sup> 當然，回亂本身有其政治及經濟因素。有傳教士指出，回亂一方面是甘肅回族在長期的政治壓迫下終失去耐性而引發，另一方面亦不可忽視經濟方面的原因。"Former Mohammedan Rebellions in Kansu," 10.

<sup>98</sup> Snyder, "The Moslems of Hochow," 29.

<sup>99</sup> 回亂也導致長居西北的漢族流徙。宣道會駐循化（Hsunhwa）傳教士C. D. Holton，曾到離循化八十里的原居民地區Kuan T'ing售經及佈道。在當地飯店結識了一個孔姓的穆斯林，得悉同治回亂期間，七十多個漢族孔姓家庭及孔子後人歸化成為穆斯林，定居於Kuan T'ing的對岸To Ho Chia。但這一點不在本文的範圍，故不詳加討論了。參C. D. Holton, "Mohammedan Descendants of Confucius,"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II: 3 (1 July 1934-18 Rabi-ul-awwal 1353): 48.

<sup>100</sup> 海春深在1933年7月4日的早晨會議上，發表了「西寧地區的穆斯林」一文，提及1648年及1876年同治年間的回亂，使很多回民被趕離家鄉。S. H. Knight, "Review of Conferences: Sining, Tsinghai,"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I: 4 (1 October 1933-11 Jumad-al-ukhra 1352): 54-55.



蘇邊境地區。部分來不及逃走的，則被清政府遷往定西、平涼、涇源、同心等所謂「自成片段，不通大路」等地區，開墾農地。<sup>101</sup>至第三、第四次回亂爆發，也同樣導致回族流徙的現象。據駐甘青傳教士的記錄，他們在不同地區都發現回族遷徙的痕跡。現簡述如下。

### 甲 從陝西到甘肅

早於1889年，當時還未發生第三次河湟事變，內地會傳教士濮美瑛的母親就首度到訪陝西鳳翔。當地人告知，鳳翔原有不少回民聚居，但自從1895年回亂爆發後，漢族聲言不容一個回民留下，自此所有回民都被逐出鳳翔。至1930年，濮美瑛與母親駐甘肅清水縣，發現當地一個村子裏的回民竟都來自鳳翔，當年「打完仗後」就遷到此地。一個回族家庭告訴她們，當地原都是漢族在住，但隨着愈來愈多回族聚居，漢族家庭都逐漸遷走了。<sup>102</sup>

甘肅北山的伊斯蘭教派以「着罕忍也」（Djahariyah，即上文「哲赫忍耶」）新教為主，此地同時是新教創辦人馬善仁（Ma Shan-ren）後人聚居的地方。他們自稱「甘肅人」，早兩三代已在此定居。然而北山也有老教（Godeemii）存在，老教教徒原是來自陝西西部，他們在1862年同治陝甘回亂（第二次河湟事變）後，流徙十年，最後在此地落腳。<sup>103</sup>

<sup>101</sup> 賴存理：《回族商業史》（北京：中國商業，1988），頁286。

<sup>102</sup> Olive Botham, "Tsingshui, Kansu,"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V:4 (1 October 1930-8 Jemadi-al-awal 1349): 9-11.

<sup>103</sup> Olive Botham, "The Djahariyeh and the Godeemii in Kansu," 16-17.

## 乙 河州餘民

一個城市或縣城在回亂中受的毀壞愈大，當地回族的流徙也愈明顯。河州是動亂之鄉，亦標誌着回族的大流徙。舊河州（包括今和政、寧定、隴西三個城市）人口約四十萬，其中十分之六信奉伊斯蘭教，其餘為漢族。1928年未發生馬仲英之亂前，俗稱「太子寺」（T'ai-tsi-si）的寧定餘下的漢族本已下多，僅餘三十戶左右。毗鄰的和政縣原亦有漢族聚居，後因大批回民移居到此，原居的漢族都四散了。<sup>104</sup>

1928年，馬仲英三圍河州，導致死傷枕藉；再加上同年南關八坊大火災，此地幾乎成了廢墟；原居的回民分散各地，主要遷移到西寧去。<sup>105</sup>也有一批回民避居化隆，人數約五百多。<sup>106</sup>

內地會傳教士海春深，就曾在西寧遇見從前在八坊認識的回族朋友；他在城郊巡迴佈道時也見到許多新近移居過來的回民。<sup>107</sup>事實上，早在第三次河湟事變後，已有甘肅回族餘民流徙到此地。上文提過海春深曾在離西寧兩天路程的「上五村」佈道，那裏每條村子都有來自甘肅的回族餘民，皆是1895年回亂後被政府強制遷移到此地的。他們仍沿襲着在甘肅時的風俗和習性。<sup>108</sup>

---

<sup>104</sup> Snyder, "The Moslems of Hochow," 31.

<sup>105</sup> 至1933年為止，據說只有約十分之三的回族前居民回歸此地。Snyder, "The Moslems of Hochow," 4-5.

<sup>106</sup> 李松茂編：《回族、東鄉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百科全書》（北京：宗教文化，2008），頁42。

<sup>107</sup> Harris, "News from the Field," 19-20.

<sup>108</sup> Harris, "News from the Field," 19-20.

除遷移到西寧外，河州也有部分回民於馬仲英之亂後流徙到岷州（今岷縣）。1933年，當地約有二百戶回民，都是由於河州於回亂後滿目瘡痍，於是移居到岷州謀生。<sup>109</sup>

秦州是另一個回亂期間遭血洗的城市，亂事後大批回民被趕逐到寧夏城（今銀川）。<sup>110</sup> 秦州北部的伏羌（Fu Chiang，今甘谷）情況相類，回亂後，城內回民不是被殺就是被迫流徙他方。<sup>111</sup>

另一個伊斯蘭教重鎮張家川，離清水縣約七十里。1929年回亂期間，因治安不靖，許多回民從張家川跑到清水作小買賣維生，也有不少婦女為躲避土匪來到此地。<sup>112</sup>

從清朝到民國的四次回亂，導致回族離鄉背井，四處流徙。這種民族大遷徙對西北地區社會結構、政經局勢帶來哪些影響，已超越本文範圍。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回族遷徙與回漢仇恨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如上所述，回民大多由於同族起亂，被趕離老家，流徙他鄉；而起亂的根源正在於回漢相仇已久，隨着歷年亂事不斷彼此屠戮，糾結更深。這個局面不僅是西北民族所面對的處境，也是傳教士在從事傳教事業時不可忽視的因素。

---

<sup>109</sup> Wm. N. Ruhl, "Minchow, Kansu,"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II:1 (1 January 1934-15 Ramazan 1352): 14.

<sup>110</sup> 內地會傳教士Helen E. Scoville於1932年初到寧夏，發現城裏到處從秦州被趕逐出來的回民，人數多得令人擔憂會出亂子。Helen E. Scoville, "Ningsia, Ningsia,"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 2 (1 April 1932-24 Zulkaidah 1350): 28.

<sup>111</sup> Botham, "The Djahariyeh and the Godeemii in Kansu," 16-17.

<sup>112</sup> "News from the Field: Miss Olive Botham in Tsingshui, Kansu," 5.

## 六 第四次河湟事變對當地傳教事業的影響

回亂嚴重打擊甘青地區的社會民生，而在當地設立傳教站、進行穆宣工作的傳教士也無法倖免。根據《友穆季刊》的會員名單，其時在甘青地區開展了穆宣工作的差會，包括宣道會（CMA），<sup>113</sup> 傳教站分設岷縣、<sup>114</sup> 循化、<sup>115</sup> 河州、<sup>116</sup> 狄道、拉卜楞等地；<sup>117</sup> 其中河州亦屬內地會的傳教範圍。<sup>118</sup> 內地會的傳教站設於秦州、<sup>119</sup> 蘭州、<sup>120</sup> 徽縣、<sup>121</sup> 西寧、安定、<sup>122</sup> 天水、皋蘭、永登、武威、西和等地。<sup>123</sup> 此

<sup>113</sup> 宣道會的穆宣對象是東鄉族和撒拉族。"Report of Work among Moslems in Kansu,"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 3(October 1927):6.

<sup>114</sup> "New Members,"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V:2 (1 April 1930-2 Zuldaidah 1348): p16.

<sup>115</sup> "New Members,"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V:4 (1 October 1930-8 Jemadi-al-awal 1349):12.

<sup>116</sup> "New Members<"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4 (1 October 1932-30 Jumad-a-ula 1351): 64.

<sup>117</sup> "New Members,"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I:4 (1 October 1933-11 Jumad-al-ukhra 1352) :72.

<sup>118</sup> "New Members,"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3 (Oct 1927): 16.

<sup>119</sup> "Members," "May Meeting of the Society,"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2 (July 1927): 12.

<sup>120</sup> "New Members,"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I:3 (July 1928): 12.

<sup>121</sup> "New Members,"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V:1 (1 January 1930-30 Rajab 1348):12.

<sup>122</sup> "New Members,"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I:3 (1 July 1933-8 Rabi-ul-awwal 1352): 48.

<sup>123</sup> "New Members,"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II:3 (1 July 1934-18 Rabi-ul-awwal 1353):60.

外，神召會（Assemblies of God，簡稱AG）的傳教地區在甘南、湟源；<sup>124</sup> 北美瑞挪會（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簡稱SAM）的傳教基地則在固原，<sup>125</sup> 亦分別開展了穆宣工作。<sup>126</sup> 馬仲英之亂期間，甘青地區的傳教事業在不同層面上都備受衝擊。以下將分述之。

### （一）傳教站被毀，傳教士避亂

馬仲英之亂期間，甘青地區的傳教站成為回軍的搶掠目標，傳教士被迫暫別傳教站避難。下文從傳教士刊載於《友穆》的信件中，整理了馬仲英之亂期間內地會在河州及秦州傳教站的情況。

#### 甲 河州醫院

河州又稱小麥加，是中國西北伊斯蘭教重鎮。1924年，內地會在河州八坊附近，為回民設立蘭州博德恩紀念醫院（Borden Memorial Hospital）的分院。<sup>127</sup> 1928年，河州三度被圍，八坊遭縱火，城郊幾夷為平地。河州分院被回軍闖入洗劫，連一門一窗都給拆除；亂匪搶掠一空後放火燒院，落成僅數年的醫院就此付之一炬。<sup>128</sup> 傳教士海春深和駐院的劉醫生家園也被亂匪所毀。<sup>129</sup>

<sup>124</sup> "New Members,"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I:1 (1 January 1933-4 Ramazan 1351):16.

<sup>125</sup>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II:1 (January 1929, Raja'b 1347):12.

<sup>126</sup> 尚有安息日會的傳教地區在陝西。陳聲柏：〈近代甘南地區的基督教傳播〉，《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1期（2007年1月），頁59。

<sup>127</sup> 河州分院於1924年秋正式開業，由內地會金品三醫生（Dr. George Edwin King）夫婦主理；1926年4月，海春深夫婦（Mr. and Mrs. G. K. Harris）述職返華後，未有回到西寧傳教站，而是調到河州分院工作。"Report of Work among Moslems in Kansu,"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3 (October 1927):4.

<sup>128</sup> "For Prayer,"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I:4 (Oct 1928):14.

<sup>129</sup> 黃錫培：《捨命的愛：中國內地會宣教士小傳》，頁173。

## 乙 徽縣

徽縣位於甘肅東南部，內地會在當地設有傳教站。徽縣猶幸未受回軍直接侵略，回亂期間所遭損失相對輕微。1929年初，駐當地傳教士賈素珍在信中提到，回亂導致內地會的傳教工作暫時癱瘓；又因徽縣縣城一半被封鎖，必須品如穀物、燃料和其他物資都非常匱乏。<sup>130</sup>

## 丙 秦州

然而南接徽縣的秦州（Tsin Chow，今天水），處境迥然不同。早在1929年初，濮美瑛前往清水縣期間，為避開亂匪曾在路上滯留了三星期。途中遇上賈素珍等，得知她們計劃走另一條路線；濮決定先與賈素珍結伴前往秦州，在那裏分道揚鑣，再前往清水縣。是時清水縣亦爆發回亂，秦安（Tsin An）和秦州兩地經常發生械鬥。濮美瑛抵達秦州後曾寫信報平安，沒想到翌日秦州就出了事故。幸最後有驚無險。<sup>131</sup>

不過，1930年1月，回軍捲土重來。先是秦州西南的西和縣被亂匪攻破，大肆洗劫。濮美瑛與母親本駐秦州，由於徽縣的丁崇德（Miss Ivy M. Dix）染上傷寒，濮須與李桂香（Miss Hilda E. Levermore）同往照料，故留下母親在秦州。4月下旬，傳言四起，有指回軍已攻陷秦州；由於消息封鎖，濮一直無法收到母親的音信，心急如焚；因為她知道秦州城內只駐有少數軍隊，若他們棄城逃走，後果將不堪設想。<sup>132</sup>

---

<sup>130</sup> 清水縣是一個戰略性的穆宣陣地，因張家川是另一個伊斯蘭教重鎮。"Notes from the Field,"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II:2 (1 April 1929- 21 Shawwal 1347):8.

<sup>131</sup> "Notes from the Field," 8.

<sup>132</sup> Olive Botham, "Hweih sien, Kansu,"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V:3 (1 July 1930-4 Safar 1349):14-15.

5月4日清晨，秦州城內傳來消息，指馬廷賢率領的回軍正往縣城馳來，並已抵達城外二十五哩，氣氛極其緊張。內地會傳教站座落城外北郊，那裏沒有守軍駐守，非常危險，故傳教站全體人員都撤入城內大街吳寶瑛醫生的診療所。<sup>133</sup> 5月6日，回軍果然攻入秦州，入城大肆燒殺搶掠。吳醫生的診療所既不能倖免，他本人亦在治理傷者之際死於回軍刀下。<sup>134</sup>

1930年6月，回軍竄走。濮美瑛重返秦州，發現許多百姓的房子和店舖已燒成焦土，當地傳教士的房屋也被搶掠一空。回軍屠秦州期間，未有外國人受傷，但有兩位信徒喪生，其中一位是吳寶瑛醫生；傷者則不止此數。<sup>135</sup> 在1930年8月7日的信中，濮美瑛再提及秦州的情況。她指不了解近期戰況，因為在秦州只能收到國民政府方面發放的消息。政府的立場很清晰：「回民」（Moslems）與「土匪」二詞可以互換使用。回族對此當然絕不同意。<sup>136</sup>

---

<sup>133</sup> 吳醫生是博德恩醫院訓練出來的漢族醫生，畢業後留院工作。1927年南京事件後，內地會全體傳教士大撤退，吳醫生於同年回家鄉秦州後，決定在當地開設診療所。參黃錫培：《捨命的愛：中國內地會宣教士小傳》，頁203。濮美瑛後來在信中亦提及吳寶瑛醫生，知道他數年前從內地會蘭州的醫院畢業，在1929年傷寒和其他流行病肆虐期間，成為傳教士很大的幫助；惜最後被亂軍所殺。Olive Botham, "Tsinchow, Kansu,"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1 (1 January 1931- 11 Sha'ban 1349):23-24.

<sup>134</sup> 當日下午，散兵前後共十六次湧進吳醫生的診療所，把所有錢財衣物洗劫一空。內地會傳教士司樂恩（Mr. Joseph S. Hulse）一度被亂匪以刀架頸，要脅他回家取錢，幸最後脫險。回軍破門而入時，吳醫生正在治理病人；回軍不由分說見人就砍，吳醫生首當其衝，頭顱被刀劈開，身受重傷。翌晨失救死亡，時年僅三十三歲。其弟吳寶琇醫生（Dr. Wu Bao-shui）也被身受多處刀傷，一隻眼睛幾近失明。黃錫培：《捨命的愛：中國內地會宣教士小傳》，頁204~205。

<sup>135</sup> 濮美瑛決定暫時留在秦州，因為她在清水縣的房子仍被軍兵佔領。回亂前，濮美瑛考慮過收拾行裝離開清水，轉往張家川工作；回亂後，已不需要回清水收拾了。Botham, "Tsinchow, Kansu," 23-24.

<sup>136</sup> 濮美瑛曾向一個回族地方官員詢問秦州的治安狀況，對方斷言當地絕對安全。Botham, "News from the Field: Tsinchow, Kansu," 20-21.

以上片段整理自《友穆》季刊。回亂期間，兵荒馬亂，通訊封鎖；傳教士在回亂現場所寫的信件能順利寄出，並得以在《友穆》刊登，實彌足珍貴。相關的資料雖僅限於內地會二三傳教站，但從中仍可一窺回亂期間傳教士的處境。

## （二）開展救濟工作

天災人禍紛至沓來，不僅黎民百姓受苦受害，當地的傳教事業亦直接受到打擊。然而，天災人禍當前，傳教士雖同為災民，卻往往盡力參與救災救人，在非常時期發揮了獨特且重要的作用。

### 甲 籌募賑災款

上文提過，早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第四次河湟事變爆發前，甘肅發生了兩次特大規模的地震。一次是民國九年（1920年）12月16日，甘肅海原縣發生大地震，死亡人數達234,117人。第二次發生在馬仲英之亂前夕，即1927年5月23日，甘肅涼州（今武威）發生大地震，稍後的6至7月間，仍有過百次餘震，死傷近八萬人，逾二十萬人淪為餓殍。地震加上回亂，又適逢西北持續大饑荒，不僅死傷無數，災民也處於水深火熱中。1920年海原大地震後，內地會傳教士安獻今代表國際統一救災會（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前往甘肅賑災。1929年，安獻今被邀重返甘肅省視察，行程因回亂而險阻重重。其中一次，當安獻今等人坐羊皮筏沿黃河而下時，得知馬仲英部被逐出寧夏後在附近沙漠某處扎營，一行人只好晝伏夜行，不幸仍被亂匪抓獲，復遭回軍開火攻擊，幸最終有驚無險。安獻今回到北京、上海報告災情後，從世界各地收到不少捐款。<sup>137</sup>

---

<sup>137</sup> 安獻今發現敵方中有一名十七歲的回族軍人是他在蘭州當校長時教過的學生。Andrew, "Islam in North-West China To-day," 56-57.



1930年春，安獻今帶着內地會總主任何斯德（Mr. D. E. Hoste）所交付的五十萬元賑款和物資，返回甘肅賑災。其時西安與蘭州之間並沒有公路，沿途盜賊猖獗。一天，在途上遇見亂匪；對方得悉驢子上馱着的是賑災款後，竟予放行。曾有商人想借傳教士作為蔭庇上路，卻被土匪揪出射殺。然而，傳教士運送賑災款項，並非每次都安全及順利。回軍搶掠陝西期間，安獻今曾被奪去賑災款共5,300元；在安定（Anting）時再被搶去1,100元，亂匪更射殺了隨行的一個漢族僕人。從中可見，在混亂的時局中，傳教士從事賑災，須承擔極大的風險。<sup>138</sup>

## 乙 派發糧食

旱災加上戰亂，饑民處處。內地會徽縣及西寧傳教站分別派發賑災糧。1929年3月中旬，傳教站開始分發糧食予災民。前來領取救濟糧的災民人數，最高紀錄是一天內達2,300人。<sup>139</sup>駐徽縣傳教士賈蘭珍（Miss Annie Garland）在1930年初的信中提到，當地正值隆冬，且是多年來最冷的一個冬季，缺糧情況愈來愈嚴重，估計饑荒將持續至六月初收割小麥之時。許多災民為換取糧食，竟殺雞取卵，把房子拆掉，變賣樑、椽、瓦片等建材。因此，她們需要考慮發放賑災糧的規模，若一開始發放太多，將不足以捱至收割季節。<sup>140</sup>

---

<sup>138</sup> 這兩筆款項最後都由回軍中較高級的負責人原封不動退還，但被殺的僕人已不能復生。Andrew, "Islam in North-West China To-day," 56-57.

<sup>139</sup> 內地會的救災工作有當地人參與。有回族客棧老闆借出地方予傳教士派糧達兩個多月之久，並幫忙維持秩序。S. J. Garland, "News from the Field: Hweihhsien, Kansu,"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II:4 (1 October 1929-26 Rabial Akhir 1348): 10.

<sup>140</sup> S. J. Garland, "Hweihhsien, Kansu,"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V:2 (1 April 1930-2 Zuldaidah 1348):13-14.

回亂雖告一段落，然而徽縣老百姓的日子仍過得艱苦。賈蘭珍及賈素珍在當地除發放賑災糧，也贈醫施藥，吸引不少民眾尤其婦女前來。<sup>141</sup> 經過半年多的賑災和醫療工作，賈蘭珍健康受損，加上從災民身上感染傷寒，終於1929年12月27日病逝。<sup>142</sup> 賈素珍仍接續徽縣的救濟工作。她與丁崇德及漢族助手們，每天分發麵包予1,550名災民。救濟工作繁重，二人在治療災民時又雙雙染上傷寒；最終賈素珍於1930年5月3日星期六病重去世。<sup>143</sup>

除徽縣外，西寧也於1930年7月展開大規模的救濟工作，由海春深主理。傳教站每天發放救濟糧予上千災民，其中五分一受惠者都是回民。<sup>144</sup>

籌募賑災款及分發糧食，都是因應天災及回亂的特殊情況而有的工作。除着局勢穩定，農民恢復耕作，救濟工作亦漸次停止。

### （三）重新檢討西北穆宣策略

第四次河湟之亂，不僅令甘青地區生靈塗炭，民不聊生，也給當地傳教事業帶來巨大的衝擊。然而，天災人禍及其負面影響，卻同時促使西方差會重新檢討過往的傳教策略。以下將從兩方面簡述回亂後傳教

---

<sup>141</sup> "News from the Field: Miss S. J. Garland in Hweih sien, Kansu,"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III:3 (1 July 1929): 7.

<sup>142</sup> Garland, "Hweih sien, Kansu," 13-14.1

<sup>143</sup> 賈素珍與丁崇德在同一天病倒，前者與病魔奮戰了一兩天後，拍了一封電報，說同工「病了」，自己則「不適」，事實上她自己的病情更嚴重。秦州同工收到電報後，由吳寶瑛醫生帶着李桂香和濮美瑛（Miss Olive M. Botham, S. R. N.）趕往徽縣，惜來不及救治，賈素珍於翌日早晨去世。Botham, "Hweih sien, Kansu," 14-15.

<sup>144</sup> Harris, "News from the Field," 19-20.

士對傳教策略的反思：第一，非常時期的應對策略；第二，漢族教會在穆宣中的角色。

### 甲 非常時期的應對策略

巡迴佈道向來是傳教士的重點工作。回亂期間，社會局勢不穩，傳教士無法自由出入縣城往鄉郊或山區作佈道。直到回亂轉移到其他地方，巡迴探訪工作才逐漸恢復。

駐西寧的海春深認為，社會及政局動盪，<sup>145</sup>反而成為當地傳教工作的好時機。西寧成為流徙回民的落腳點及避風港；回民佔全市人口的三份之一。1930年間，除了福音堂維持定期聚會外，海春深仍能在回民區作街頭佈道，及逢星期五（回民做禮拜的日子）派發免費小冊子和福音書，甚至偶爾到鄉郊探訪。<sup>146</sup>據海春深的報告，透過城郊、外區佈道、穆民會客室等地方接觸到福音的回民相當多。不少穆民甚至到福音堂參加主日崇拜聚會。其中一位穆民於1930年祕密皈主。<sup>147</sup>

然而，宣道會駐岷州傳教士呂成章（Wm. N. Ruhl）卻有不同的看法。岷州市內約有二百戶回民，其中不少原居於河州，於馬仲英之亂河州幾夷為平地後，移居到這裏謀生。呂成章的經驗是，回亂後（1933年）要接觸回民非常困難，而真正對福音感興趣的回民更是少之又少。<sup>148</sup>

---

<sup>145</sup> 指1930年馮玉祥（Feng-Yu-Hsiang）撤換了馬麒青海省主席（Governor）一職。到年底，馬麒突然復職，馮玉祥的軍隊撤出青海。Harris, "News from the Field," 20-21.

<sup>146</sup> 季伯禮（Mr. Keeble）在蘭州進行關於饑荒救濟的調查後，曾到西寧協助海春深作街頭宣講。Harris, "News from the Field," 19-21.

<sup>147</sup> Harris, "News from the Field," 20-21.

<sup>148</sup> Wm. N. Ruhl, "Minchow, Kansu,"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II: 1 (1 January 1934-15 Ramazan 1352): 14.

駐不同地區的傳教士對回亂後佈道工作的效果，顯然有不同的經驗及看法。毋庸置疑的是，百姓飽嘗天災人禍之苦之際，救濟工作讓傳教士適時發揮了救死扶傷的功能，為災民提供了實質的幫助。海春深在1933年的穆宣會議上就指出救濟工作確頗見成效。<sup>149</sup> 透過救濟工作，傳教士比正常時期能接觸到數目更多的民眾，尤其是回族。事實上，饑荒和大地震後回族人口的增長比漢族更多；<sup>150</sup> 換句話說，佈道對象的人數是有所增長的。值得注意的是，從救濟工作直接受惠的回民，普遍對傳教士提供的幫助欣然接受，也比平日更樂於與後者建立關係。例如駐徽縣傳教士賈素珍在回亂過後饑荒期間分發糧食，贈醫施藥，不少受惠的婦女出於感激而主動邀請賈回家作客。這種反應是平日鮮見的。<sup>151</sup>

## 乙 漢族教會在穆宣中的角色

傳教士在西北拓展穆宣事業，可謂舉步維艱。基本上他們期待當地漢族教會能關注甚至承擔向穆民佈道的責任，然而現實與期待相距甚遠。原因有二。第一，西北漢族教會一直處於弱勢。內地會傳教士吳林德（L. C. Wood）指出，中國有一個獨特現象，就是在穆斯林最強勢的地區，基督教會就最弱；換言之，穆宣需要最大的地方，基督教的影響力就最小。以甘寧青地區為例，按教會名冊約有五千名基督徒，而穆民卻有250萬。<sup>152</sup> 第二，對穆宣有熱誠的漢族信徒少之又少。吳林德在寧夏一個回民區進行巡迴佈道，有九年之久；在七次長途佈道旅程

---

<sup>149</sup> S. H. Knight, "Review of Conferences: Sining, Tsinghai,"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I:4 (1 October 1933-11 Jumad-al-ukhra 1352): 54-55.

<sup>150</sup> Andrew, "Islam in North-West China To-day," 56-57.

<sup>151</sup> "News from the Field: Miss S. J. Garland in Hweihshien, Kansu," 7.

<sup>152</sup> L. C. Wood, "The Unavoidable Issue in North-west China," *Moslems in China, British Supplement to Friends of Moslems* (Summer 1946):6.

中，他有時與其他傳教士配搭，有時則只有漢族助手幫忙。這九年間，吳林德發現僅有一位漢族信徒真正對穆民懷有熱誠。<sup>153</sup> 當然，關心穆民的漢族信徒並非絕無僅有。經常與內地會傳教士配搭的冼先生（Mr. Hsien），在河州和西寧兩地經常協助街頭佈道工作。冼作為傳道員，有多年向穆民佈道的經驗，經常傳講「穆民能夠得救也必須得救」的信息，頗見成效。<sup>154</sup> 內地會丁崇德也曾提到徽縣有一位漢族同工對穆民很關心，特意收集穆民常用的詞彙，並有技巧地向他們講福音。<sup>155</sup> 惜上述例子僅屬少數。

漢族信徒在成熟度、能力和心志上，固然遠未能承擔穆宣責任；而經過回亂，目睹回漢民族之間的仇恨，加上在穆民中工作的經驗和反思，傳教士對漢族教會在穆宣上的角色更增添疑慮。如上所述，回漢仇恨不單純由於民族、宗教、文化、語言相異，或彼此缺乏了解等表面的因素；更因為自清朝起，兩個民族間確實有互相屠戮的紀錄。歷時數載的馬仲英之亂，就有超過十萬漢人被回軍所殺。<sup>156</sup> 回漢仇恨既為無法漠視的事實，傳教士要問的是：漢族教會承擔穆宣工作「恰當」嗎？甚至是「可能」嗎？他們主要從以下兩方面進行思考：第一，漢族信徒參與穆宣有幫助嗎？還是反成為障礙？第二，從事穆宣者需要專業訓練，漢族信徒是否具備相關條件？

---

<sup>153</sup> Wood, "The Unavoidable Issue in North-west China," 7.

<sup>154</sup> Harris, "News from the Field," 20-21.

<sup>155</sup> Ivy M. Dix, "Hweih sien, Kansu,"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2 (1 April 1932-24 Zulkaidah 1350): 26-27.

<sup>156</sup> 據池維謀所知，有回軍洗劫城鎮時邊喊「殺拜鬼族！」邊殺漢族；他分析這種仇殺漢族的慾望已超越宗教狂熱的程度。Knight, "Review of Conferences: Afternoon July 5th," 58-59.

第一方面，漢族信徒參與穆宣的利弊。內地會傳教士濮美瑛認識一個漢族信徒婦女，她熱心探訪，身上經常帶着福音小冊子，一有機會就向婦女們傳福音或邀請對方去聚會。這位婦女曾向濮美瑛訴苦，說回族婦女的福音工作不好作。她多次叩過回族婦女的家門，每次都吃閉門羹，有時想在門口多站片刻也不成功。回族婦女的回應往往是：她們已經擁有自己的教義，不需要其他宗教。<sup>157</sup>

從上述例子可見，在漢族婦女身上行之有效的佈道方法，完全不適用於回族婦女。更重要者，漢族傳福音，即時就引起回族的反感和抗拒。濮美瑛發現，這種情況在爆發過回亂的地區尤其顯著。雖然回漢間的敵意不常浮面，但只消小事一樁就足以一觸即發。西方傳教士在接觸回族方面反具優勢，最少不用面對民族仇恨的問題。<sup>158</sup> 從這個角度來看，漢族信徒反不利於回族福音工作。

第二方面，專業裝備的需要。與駐中國其他地區的傳教士比較，專職穆宣的傳教士本來就需要達到更嚴謹的要求，接受更專業的裝備。前者需要學習當地語言；後者除學習西北地區方言和漢語外，還得習阿拉伯語。前者需要了解當地民間宗教；後者最好對伊斯蘭教、古蘭經有研究，掌握當地伊斯蘭教的歷史背景和特色。前者需要住在福音對象中間建立友誼；後者也得花上長時間，方能取得穆民及宗教領袖的信任，了解攔阻他們接受基督教的真正原因。一般的福音文字材料未能引起穆民的興趣，得為他們量體訂造福音書冊……換句話說，向穆民傳福音，傳教士不能已照搬對漢族傳福音的一套老方法，也不能期望穆民會自動

---

<sup>157</sup> Olive Botham, "One Difficulty in China,"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3 (1 July 1931-14 Safar 1350):17-18.

<sup>158</sup> Botham, "One Difficulty in China," 19.

走進福音堂聽道。<sup>159</sup> 穆宣工作需要大量具備能力與心志的工人，或者直接地說，穆宣需要的是「專家」。漢族信徒顯然尚未具備上述條件。

由此，傳教士開始把期望轉移到穆斯林皈依改宗者身上。有傳教士觀察到，在聽福音和研讀舊約（The Former Scriptures）方面，穆民比漢族信徒往往表現出更大的熱誠和更強的學習能力。濮美瑛認為，與其裝備漢族信徒來承擔穆宣工作，倒不如花費同等的氣力去裝備穆斯林改宗者，由他們向漢族傳福音。<sup>160</sup> 都孟高（M. H. Throop）博士也認同穆斯林皈依者是最可靠的人選，其中佼佼者包括四川保寧（Paoning）內地會的古主教（Bishop Ku）、廣西教會傳道會（Kuangsi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第一位聖職人員宋崇真牧師（Rev. Soong Tsong-chen）、江蘇鎮江（Chinkiang）長老會的馬傳道（全名Ma Fung-po）和熊傳道（全名Hsiung Hung-chih）等。<sup>161</sup>

向「鄰舍」即穆民傳福音，漢族教會原是責無旁貸的。然而，基於民族及宗教隔閡、長久以來累積的仇恨，並能力和動力皆不足的情況下，漢族教會不僅無法承擔向穆民傳教的責任，甚至某程度上成為了絆腳石。穆宣的擔子，基本上完全落在西方傳教士身上。

## 七 結語

向穆斯林傳教本來就不易為之。池維謀博士（Dr. S. M. Zwemer）曾在一個傳教會議上指出，穆宣傳教士面對重重困難，包括效果不彰、

---

<sup>159</sup> Botham, "One Difficulty in China." 19.

<sup>160</sup> Botham, "One Difficulty in China," 17-18.

<sup>161</sup> M. H. Throop, "The Whole Gospel of God,"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4 (1 October 1932-30 Jumad-a-ula 1351): 50-51.

吃教者眾、皈信者夭折率高等等。<sup>162</sup> 在中國西北開展穆宣工作的傳教士，他們除了面對上述困難外，還得深入了解這片獨特土地上慘痛的歷史，和民族間的糾結。

馬仲英之亂無疑是甘青地區的一場災難，對社會民生造成的破壞無法估計。家破人亡，被迫流徙他鄉者眾；加上天災連綿，荒年不斷，令回漢百姓皆苦不堪言。是次回亂，回漢民族彼此屠戮，更進一步激化了民族之間的仇恨。民族間的傷痕，比社會民生所蒙受的損害更深，也更難復元。

回亂期間，當地傳教站遭毀壞，傳教工作被迫停頓，傳教士也與黎民百姓一起逃難受苦。內地會為回民設立河州分院，投入不少人手資源，落成僅數年，就在回亂中付諸一炬，即是一例。不過，從另一角度看，回亂以前，當地穆宣工作本來就舉步維艱，效果不彰；相對而言，已建立的有限，能損失的也有限。經此一役，傳教士重新開展工作；他們不僅有服事傳教對象的機會，也對穆宣策略有了新的反思和調整。

天災人禍下，最直接令災民受惠的就是救濟工作。傳教士透過籌募賑災款、分發救濟糧，贈醫施藥，對災民提供了最實際的幫助。內地會賈蘭珍和賈素珍兩位資深的穆宣傳教士，正因為於非常時期投身救濟和醫療工作，從災民身上感染致命的傷寒，先後離世。傳教士在救濟方面的努力，除了直接讓災民受惠，某程度上也拉近了兩者的距離。回民受宗教背景和宗教領袖（阿訇）的箝制，對基督教一般抱着敬而遠之的態度。傳教士平日多藉街頭佈道，或靠日常生活的接觸，例如與木材

---

<sup>162</sup> 1933年6月至7月在河南開封舉行的傳教會議，集合了來自不同差會、在各個省份如鄭州和西安等地工作的穆宣傳教士。池博士在6月2日的會議上提出上述困難。S. H. Knight, "Review of Conferences: Sining, Tsinghai,"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I: 4 (1 October 1933-11 Jumad-al-ukhra 1352): 54-55.



或牛奶商販攀談，或免費提供拔牙服務等作為傳教的渠道，惟效果並不顯着。<sup>163</sup> 然而，透過救濟工作，傳教士得以接觸到從前無法接近的百姓，特別是回民，甚至能進一步建立友誼。這是救濟工作帶來的顯著效果。

這場回亂，傳教士親歷其境，讓他們對西北地區回漢之間的仇恨有深刻的體會。過往對漢族教會承擔穆宣責任的期待，也因而有所調整。漢族信徒在成熟度、心志和能力上，仍未能承擔如此重任；更重要的是，回漢間的仇恨，反使漢族信徒成為穆民皈信的攔阻。差會及傳教士相信，專職的、受過良好訓練的傳教士，仍然是西北地區穆宣的主要力量。

在傳教士眼中，「莊稼多，工人少」，正是西北穆民地區的寫照。回亂過後，與黎民百姓同受過苦害的傳教士，繼續默默耕耘，同時致力向西方教會發出呼聲：中國西北需要更多具備堅強心志和優良裝備的工人，共同開拓穆宣事工。

---

<sup>163</sup> C. F. Snyder, "The Moslems of Hochow,"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III: 2 (1 April 1934-16 Zu-1-Hijja 1352): 29.

## 撮 要

清朝以還，中國甘肅、青海地區爆發過三起回族叛變事件，被稱為回亂的溫床。民國十七年（1928年），回族馬仲英在甘肅河州起事，史稱第四次河湟事變。這場回亂歷時四年，波及的範圍從甘青地區延至新疆；不僅嚴重破壞了當地的社會民生，對西方差會一直艱苦經營的傳教事業，也帶來沉重打擊。本文旨在整理第四次河湟事變的始末，並從《友穆季刊》（*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所刊載的相關資料中，嘗試探討回亂對甘青地區社會及當地傳教事業造成的影響。

## ABSTRACT

Moslem Rebellions kept breaking out in Kansu and Tsinghai provinces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This district was known for a hotbed of riots accordingly. In 1928, Ma Chong-ying, a young Moslem General, rose in rebellion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n Hochow. It was known to history as the Fourth Moslem Rebellion in the Hehuang area. The event that lasted about 4 years reduce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to destitution as well as the mission work which had been developed by the missionaries in the Northwest China. This article aimed to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Moslem Rebellion, and to analyse the influences to the whole society and the mission work it brought about in the light of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